

萧友梅与北大音乐传习所

李 静

(北京大学 艺术学系, 北京 100871)

摘 要: 萧友梅先生是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最早出国学习音乐而且时间最长的学生, 同时也是第一位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音乐家。他一生致力于音乐教育事业, 创办了我国第一个专业音乐教育机构——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 编写了我国最早的一批专业音乐教材; 创作了我国最早的一批学校歌曲; 最早将西方音乐理论及技法引进中国, 并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 创建了我国近代音乐史上第一支完全由中国人组成的西式管弦乐队; 在专业音乐创作方面, 他是中国最早涉足西方军乐合奏、管弦乐合奏曲、艺术歌曲创作的作曲家; 在音乐理论研究方面, 他最早开展中西音乐的比较研究。他是我国近现代专业音乐教育的奠基人, 专业音乐创作的先行者, 音乐理论研究的探索者, 专业音乐的拓荒者, 为发展中国近现代音乐文化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关键词: 萧友梅; 音乐教育; 北大; 音乐传习所; 管弦乐队; 音乐创作

中图分类号: K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19(2004)02-0140-05

萧友梅先生是我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奠基人, 杰出的作曲家、音乐理论家。1902年自费赴日本留学, 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学习, 同时在东京帝国音乐学校学习钢琴、声乐, 在此期间由孙中山先生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1906年毕业, 获广东省官费留学生资格, 于是年7月入东京帝国大学文科攻读教育学, 并继续在音乐学校学习钢琴, 1909年大学毕业后归国。1912年3月, 中华民国成立后, 曾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 1912年11月公派德国留学, 就读于莱比锡音乐学院理论作曲系, 同时在莱比锡国立大学哲学系学习。1916年7月, 萧友梅以论文《十七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的研究》获得莱比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是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最早出国学习音乐而且留学时间最长的学生, 同时也是第一位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音乐家。1920年归国, 不久应蔡元培校长邀请来北大从事教学、管理工作。

1927年6月奉系军阀政府取消了北大音乐传习所。随后蔡元培提议在上海创设音乐院, 于是萧友梅便来到了上海, 创办了中国第一所专门的音乐学院——上海国立音乐院。此后一直在该校任院长, 从事教学工作, 1940年病逝于上海。

萧友梅先生在北大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 但他对北大早期的音乐教育以及对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作出了非常重大的贡献。

一、专业音乐教育的奠基者

萧友梅先生学习、借鉴西方音乐教育的经验, 发展中国音乐教育。他的历史功绩首先是开启了中国专业音乐教育之先河。

1916年, 北京大学一些爱好音乐的学生, 自发组织了一个研究音乐、陶冶情操的课外活动组织——音乐团, 后改名为音乐会。1919年在蔡元

收稿日期: 2003-10-18

作者简介: 李 静(1960—), 女, 安徽巢湖人, 北京大学艺术学系副教授, 史学硕士。

培校长的提议下,改组为“北大音乐研究会”[1],蔡元培先生任该会会长。研究会毕竟是一些学生凭热情和兴趣组成的课外活动组织,学生要想提高业务水平,需要老师的指点,于是他们与蔡元培校长商讨,希望延聘导师。这一要求得到蔡元培校长的大力支持。蔡校长得悉萧友梅回国,亲自出面邀请萧友梅先生到北大任教,当时没有音乐系,在所有学科中以中文最近,所以蔡将萧纳入该系作为正式教员(讲师),实际在音乐研究会任课。从新学期“课程表”[2]和“本校布告”[3]可以看出,萧友梅一人承担了四门课,即普通乐理、音乐史、和声、作曲法。萧友梅的到来,使音乐研究会迈入了一个新的里程,同时也揭开了中国音乐教育史上新的一页。

萧友梅先生在国外留学近二十年,对西方诸国,尤其是德、法、意、日等国家的音乐教育历史及其科学进步的办学方针、措施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和研究,他知道要使更多的人认识到音乐的真正价值,惟一的途径就是发展现代专业音乐教育,培养和造就具有现代专业知识技能的众多人才。他回国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什么是音乐?外国音乐教育机关。什么是乐学?中国音乐不发达的原因》[4],文章通过中西方音乐教育状况的比较,指出了历代中国音乐教育的弊端,论证了中国音乐不发达的原因是不重视音乐教育。他认为:“我们今天若是还不赶紧设一个音乐教育机构,我怕将来音乐界一方面,中国人很难出来讲话了。”[4]由此可以看到他开拓、振兴中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决心和宏愿。1923年3月25日北大评议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一份蔡元培校长手书的《提议北大学生事业委员会名单》[5](P485),萧友梅为委员之一,负责对音乐研究会的调查。通过调查研究,萧友梅认为该会属课外活动性质,不易收到预期成效。于是萧友梅向蔡元培提议改组音乐研究会为音乐传习所,由学校组织办成正式的教学机构。“十一年八月评议会通过北大附设音乐传习所简章”[6],从1916年的学生社团性质的音乐团——音乐会——音乐研究会,几经演变,于1922年终于成为一个专业音乐教育机构——北京大学附设

音乐传习所。这一切与萧友梅先生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可以说,萧友梅的到来,标志着我国高等专业音乐教育的开始。8月19日《北京大学日刊》登出了《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简章》[7],蔡元培为该所所长,萧友梅受聘为该所教务主任兼导师,宗旨为:以养成乐学人才为目的,一面传习西洋音乐(包括乐理与技术),一面保存中国古乐。该所遵照蔡元培“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采兼容并包主义”[8](P179)的办学方针,在具体办学模式及课程设置方面,萧友梅大量参考欧美音乐院校的办学经验,同时也充分考虑中国国情和民族特点。其分科为本科、师范科、选科三种。师范科分甲、乙两种,本科或甲种科四年,或修满120学分即可毕业;乙种或选科修满60学分即可毕业。音乐传习所的课程设置较完备、合理、科学。如《甲种师范科课程表》[9]四年共修30门课,其中专业课如普通乐学、和声、作曲、对位、视唱、声乐、器乐等20门,基础理论课如教育学、心理学、教授法等8门,外语2门。由此可见,萧友梅在课程设置方面,既重视专业知识的教育,也重视整体素质的培养,既考虑西方音乐理论及技巧的系统教学,也考虑到中国民族音乐的传授,并要求音乐科的学生除必修钢琴外,都必须学一到两种中国民族乐器。

音乐传习所实行单独招生、单独聘师,课程独立,有学分、学制,是由学校组织成立的正式教学机构。1927年,刘哲任教育总长,他认为音乐有伤风化,无关社会人心,下令取消北大音乐传习所。短短五年时间,中国近代第一个高等专业音乐教育机构——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就这样夭折了。但是它已建立起一套办学模式并已取得重要的实践经验,20年代后成立的其他专业音乐教育机构,其办学方针、模式基本上是因袭北大音乐传习所。萧友梅是北大音乐传习所创始人,同时也是上海国立音乐学院的创办人,所以北大音乐传习所也为后来创办上海国立音乐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萧友梅对创办北大音乐传习所功不可没,他不愧是我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奠基人,是他开启了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先河。

二、创建我国第一支西式管弦乐队

根据萧友梅在《音乐传习所对本校的希望》^[10]中所说,民国前二十三年(1889年),海关总税务司司长赫德(英国人)利用海关税项,在海关成立了管弦乐队,赫德去世后,因活动经费无着乐队便解散了,民国三年(1914年),京汉路局法人何图重组乐队,于民国八年(1919年)又因缺款解散。蔡元培先生对此非常同情,将乐队转接下来,由于经费紧张,只能聘六位导师,后来在萧友梅先生努力下,逐步发展到16人左右,于1922年4月正式成立。这是“一件最可喜、最侥幸的事,也是一件最可纪念的事,因为本乐队算是本国人组成的全国唯一的管弦乐队”^[10]。乐队由萧友梅组织排练,并亲自任指挥,从每次演出的节目单上可以看出这个乐队基本上保持十六人左右,有一部分是本校的教师兼队员,还有一部分是外聘的。从《音乐传习所第八次音乐会导师姓名》^[11],可以看出乐队的人员和编制:

本乐队导师姓名

钢琴:嘉祉 小提琴:甘文廉 大提琴:傅松林 鬻粟:
王广福△ 小提琴:赵年魁 小提琴:孟范泰△ 低音
提琴:徐玉秀△ 小铜角:刘天华 小提琴:那金立△
中音提琴:乔吉福 长笛:李延桢 小提琴:全书荫△
法国铜角:连润启△ 大提琴:李延贤△ 鬻粟:穆志清
低音细管:潘振宗△ 指挥:萧友梅
(注有△号为临时加入演奏员)

这样的编制和人员自然水平不算很高,乐器也缺了很多,但却举办了多场音乐会,并能演奏一些大型的交响音乐,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据萧友梅先生回忆:“这个乐队从民国12年秋到民国16年春,曾在北京大学第二院举行过42次管弦乐演奏会。”^[12]从音乐会的节目单中可以看出音乐会上主要介绍西欧名曲,曲目包括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作品,如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田园交响曲》,海顿的《军队交响曲》,门德尔松的《仲夏夜之梦》以及浪漫派的一些较简单的歌剧序曲和民间乐曲等。乐队的规模虽然不大,但是它是中

国近代史上第一支完全由中国人组成的西式管弦乐队,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可以说由中国人担任指挥、中国人演奏外国作品,是从这里开始的。

三、引进和传播西洋音乐

萧友梅先生除忙于繁杂的教学管理工作外,还直接参与教学工作,最早将西方音乐理论及技法引进中国,并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在北大期间他承担的课程有:基本乐理、和声学、作曲法、中外音乐史、管弦乐队指挥等。他的课讲得非常精彩,他侄女儿在回忆录中写到:“二叔在北京大学教学,他讲音乐史及和声学,来上他的课的学生竟有千人之众。”在教材建设、音乐理论研究方面萧友梅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他编写的教材有:《普通乐理》(1920年6月北大《音乐杂志》陆续刊登);《和声学纲要》(1920年12月北大《音乐杂志》陆续刊登);《近世西洋音乐史纲》(1920年至1923年间编著,为校内教本形式草印的著作);《风琴教科书》(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钢琴教科书》(192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小提琴教科书》(192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等。他所编写的教材很注重教学法的运用,深入浅出,循序渐进,是我国近代最早的专业音乐教材。这些教材对促进当时的专业音乐教育以及对于当时音乐教育的普及和提高,都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与此同时,他还和易韦斋合作编写了大量专门提供学校音乐教学所习唱的各种形式的歌曲,分别编入《新歌初集》(1923)、《今乐初集》(1924)、《新学制唱歌教科书》(共三册1924)。这些歌曲集是我国最早出版的作曲家个人作品专集,为我国学校歌曲由过去的“选曲填词”的方式转向完全创作的方式开了先河。此外,萧友梅先生还撰写了许多音乐理论著作和音乐论文,如《什么是音乐?外国的音乐教育机关。什么是乐学?中国音乐教育不发达的原因》^[14]、《说音乐会》^[13]、《中西音乐的比较研究》^[14]等。特别是《中西音乐的比较研究》,采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中西音乐,这在我国还是第一次。运用比较的方法,可以帮助人们从封闭的思维中解放出来,把中国音乐放到广阔的背景上加以考察对比,从而更深刻

地认识中国音乐的特点和价值。

四、中国近现代专业音乐创作的先行者

萧友梅是我国新音乐创作的先行者、探索者,他除教学、管理、组织音乐会之外,还从事音乐创作。如歌曲《落叶》是一首描写悲秋愁绪的抒情曲,用的是欧洲传统和声小调音阶,委婉中带有几分伤感;独唱曲《问》(1922)则是他最有影响的代表作品,这一作品借鉴德国艺术歌曲的特点,含蓄地写出了当时青年人对山河割裂、国家沉沦的忧虑的感情,曾在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广为流传;《卿云歌》(1920)这首歌,被北洋政府“国歌研究会”选中,自1921年7月1日定为正式“国歌”。虽然这首歌词意深奥,不易被大众所理解,且使用时间不长,但它终究有一定的代表意义,对当时的青年具有一定的影响。他为纪念“五四”运动一周年而作的《五四纪念爱国歌》,是我国最早以这场反帝爱国斗争为题材的合唱作品。器乐作品有管弦乐《新霓裳羽衣舞》、《哀悼进行曲》。《新霓裳羽衣舞》首演于1923年12月17日,即音乐传习所第15次音乐会,这是我国近代音乐史上第一首由中国人创作的西式管弦乐曲,该曲以五声音阶为主,是一首以民族历史题材写作的西式器乐曲。谭抒真(当年北大音乐传习所的学生)在回忆东华门大街真光电影院的一场音乐会时,曾对该曲这样描述:“这首乐曲虽然用外国乐器演奏,它的音乐效果却完全是中国味道,所以给我印象特别深。”《哀悼进行曲》首次演出是1925年3月28日第19次音乐会,原曲《哀悼引》是一首钢琴曲,创作于1916年,是为悼念黄兴、蔡锷的去世而创作的,是现在所能见到的我国音乐家创作的第一首钢琴作品;为悼念孙中山先生,于1925年改编成管弦乐曲《哀悼进行曲》。

萧友梅的作品,大多创作于20年代前半期的北京,这个时期中国能掌握西洋近代作曲方法的人简直是寥若晨星,荒若沙漠。萧友梅正是在沙漠中奋斗、探索,他取来了西方近代音乐文化之“经”,并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迈出了我国近代专业音乐创作的第一步,虽然那些作品还不够成

熟,但在那个时代,已是一种创举,一种新事物,萧友梅无疑是我国专业音乐创作的先行者。

萧友梅先生创办了我国近代音乐史上第一所专业音乐教育机构,揭开了我国现代音乐教育史的新篇章,他是我国近现代专业音乐教育的奠基人。在音乐传习所里,他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完全由国人组成、由国人指挥的小型管弦乐队。他是我国现代音乐史上第一个向国内音乐学校系统地介绍、讲授西洋音乐理论的音乐教育家。他编写了我国最早的一批专业音乐教材。他的音乐创作,结束了“选曲填词”时代,是我国专业音乐创作的先行者。在理论研究方面,他最早开展中西音乐的比较研究,是我国近代音乐史上一位杰出的音乐理论研究的探索者。他对中国的近现代专业音乐教育的巨大贡献,会永远铭刻在历史上。

参 考 文 献:

- [1] 北大音乐研究会章程[N]. 北京大学日刊, 1919-01-30.
- [2] 课程表[N]. 北京大学日刊. 1920-09-16.
- [3] 本校布告[N]. 北京大学日刊, 1920-10-27.
- [4] 萧友梅. 什么是音乐? 外国音乐教育机关. 什么是乐学? 中国音乐不发达的原因[J]. 音乐杂志(北大), 1920, 1, (3).
- [5] 高平叔. 蔡元培年谱[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6] 萧从芳. 音乐传习所之历史及其研究运动之意义[N]. 北京大学日刊, 1929-05-23.
- [7] 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简章[N]. 北京大学日刊, 1922-08-19.
- [8] 蔡元培选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9] 甲种师范科课程表[N]. 北京大学日刊, 1922-08-12.
- [10] 萧友梅. 音乐传习所对本校的希望[J]. 北京大学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刊, 1923-12-27.
- [11] 音乐传习所第八次音乐会导师名单[N]. 北京大学日刊, 1923-05-05.
- [12] 萧友梅. 赵梅伯《合唱指挥法》序[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46.
- [13] 萧友梅. 说音乐会[J]. 音乐杂志(北大), 1920-08-31, 1(5.6合刊).
- [14] 萧友梅. 中西音乐的比较研究[J]. 音乐杂志(北大), 1920-10-31, 1(8).

Mr. Xiao Youmei and Music Institute of Peking University

LI Jing

(The Department of Arts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Mr. Xiao Youmei is the earliest music student to go abroad in the Chines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music history. He was also the first Chinese person to attain the music PhD in abroad. He paid more attention on music education and built the first Chinese music education institute—Music Institute of Peking University. At the same time, he compiled the music textbooks, produced the earliest campus songs, introduced the western music theory and music technique into China and explained it in details. He also organized the first Chinese Orchestra from the Chinese people totally. In professional music creating, he covered in the west army instrumental ensemble, orchestra ensemble and producing arts songs very early. In music theory aspect, he suggested to study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west and east music by using the comparative method. He was the founder, forerunner and investigator on the Chinese professional music education. He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on the Chines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music education.

Key words: Mr. Xiao Youmei; Music Education; Peking University; Music Institute; Orchestra; Music Creating

(责任编辑 杜家贵)

(责任校对 刘曙光)

王东《中华文明论》出版座谈会暨民族精神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3年11月22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北大哲学系“21世纪哲学创新论坛”,联合在北大办了“《中华文明论》出版座谈会暨民族精神学术研讨会”。《中华文明论——多元文化综合创新哲学》是王东教授新出版的一部大著,共三卷,176万字。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重要科研单位的一批著名专家学者张岱年、黄楠森、庄福龄、邢贵思、汝信、严文明等,及《人民日报》、《光报日报》、《中国教育报》、《北京大学学报》、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等重要媒体,群贤毕至,汇聚一堂,畅所欲言。

研讨会由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赵敦华教授和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所长李景源研究员主持,旨在通过对《中华文明论》的研讨,唤起大家对中华文明和民族精神的起源、发展与未来创新问题的更进一步关注。研讨会首先由《中华文明论》的作者、北京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主任王东教授,以《为中华民族精神开掘源头活水——〈中华文明论〉的一个主题与六大问题》为题,简要介绍了《中华文明论——多元文化综合创新哲学》的写作主旨、基本问题、理论创新与遗留问题。《中华文明论》,是王东继承发展张岱年先生综合创新论的一部鸿篇巨著。它不仅是一部哲学著作,也是一部跨学科著作,内容宏富,涉及大量的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文化学等诸多学科知识,堪称一部具有创新体系的中华文明论巨著。这部图文并茂、雅俗共赏的创新之作,从唯物史观和历史哲学的高度,从总结20世纪中国考古大发现入手,力图从新的史料论证中华文明的世界历史地位,回答在新世纪“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发展问题,揭示出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的东方源头和现代活水。首倡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的张岱年先生,虽已94高龄,也特意赶来参加了会议。他说:“王东教授支持我倡导的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论,我非常高兴。《中华文明论》是一部很有意义的大著作。这部书的出版,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大喜事!”黄楠森教授指出:“《中华文明论》是王东教授经过长期准备、潜心研究,写出的一部中国文化研究专著,也是一部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与文明观的创新之作,呼唤中华民族精神的学术力作。这里提出的问题,解决的问题,还有没解决好的问题,许多是有启发性、全局性、前瞻性的,值得在学术界中引起深入探讨。”邢贵思教授对此书也道出了自己的见解:“王东这部著作170万字,我很钦佩。花了十年时间,写出篇幅很大、内容充实而且有时代精神、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著作,是近年来学术界不多见的,有这样的气魄、毅力是很不容易的。这本书还有一个很大优点,即:第一卷关于上古史料的收集相当多,王东在这方面收集的材料相当详尽,他根据自己的理解,根据对材料的辨析,提出自己独立的看法,也是难能可贵的。搞哲学的人敢于对上古史表明自己的独立看法,本身也很不容易。”汝信研究员对此书也给予了客观的评价,他说:“这样一部全面深入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的三大卷,可以说鸿篇巨著,由一位学者独立完成,确实难能可贵。这部书内容丰富充实,涉及面很宽广,尤其分析很细致,很深刻。全书立意高远,读此书完全能体会到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及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崇敬之情。”严文明教授说:“《中华文明论》作者具有一股激情和极大的毅力,在浩如烟海的史料、堆积如山的考古资料和纷繁复杂的各种理论中,试图把中华文明的特质、发展主线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阐释清楚,进而寻找出中国文明向何处去的明确答案,为规划中国现代化道路提供理论依据。”“尽管对一些考古资料的解说还有可商榷之处,但就整个体系来说,不失为一部颇有特色的力作。”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庄福龄、李伯谦、李景源、刘长林、吴同瑞、龙协涛、韩庆祥、许全兴等。与会学者认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一定要有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北大学者更应是学术大器者,应眼光高远,用自己的著述推进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王东的书蕴涵着一种学术激情,一种对国家、对民族、对时代的深切关爱,这正是学者们所赞许的。

(王如 讯)